

晚上8點,我在校門外等她。雨忽然下起來,越下越大,嘩啦啦地拍打着學校門口的頂棚,本來干爽的地面,一時半刻便水流成河。我準備打電話讓她先避一下雨,她卻已經出來了。

她是守約的孩子,怕我在外面等久了,便急匆匆地跑出來。她也是周全的孩子,在雨季總是隨身帶著傘。但是這雨實在太大,從教室到學校門口這短短的一段路,她的運動鞋已經進水了。

我把傘偏向她,她馬上推了過來:“我的鞋子已經濕了,就不管它了。媽媽,你不要把鞋子踩濕了,會冷的。”

到家後,我的鞋里仍然干爽,她的襪子全部濕透了。她的雙腳冷得像冰,在熱水里泡了好一會兒才緩過來。

我應該會一直記得這個細節吧。記得一個春寒料峭的雨夜,女兒穿著濕透的鞋子,把雨傘推向我這邊。

在我的寫作課上,班長宋丹寫過一篇文章,描述她女兒上小學時,有一次她去學校給女兒送飯,將車停在離校門口三四百米的地方,正準備下車,突然下起了雨。她在車里找了半天,摸到一把傘,慌慌張張地沖下車,把傘和

看見生活的甜

飯一起遞給在屋檐下翹首以盼的女兒,讓她趕快回教室趁熱吃。誰知女兒一直磨蹭著不走,反而奔了過來:“媽媽,這雨不知道下到什麼時候,我把你送到車上再回去吧!”小小的女兒撐著傘,把貓著腰的她送回車里。關上車門的瞬間,她的淚幾乎掉下來——女兒本可以急匆匆地吃飯,甚至還可以抱怨媽媽到晚了,但是女兒沒有,女兒心里惦記著:媽媽怎么回去?媽媽會不會被淋濕?

每個媽媽都有這樣的時刻吧?當我們與生活苦苦纏斗,當我們在不同的門外等著性情各異的孩子,當我們做好了他們會抱怨、會挑剔、會覺得理所當然的準備,他們卻流露出意料之外的愛和關懷,瞬間將我們擊中,於是艱辛盡洗,餘生可期。

前些日子,一個朋友向我傾訴,說孩子成績不好,她很著急。

我問:“除了成績,孩子其他方面怎麼樣?身體好嗎?心情好嗎?喜歡上學嗎?”她說:“其他都很好,吃嘛嘛香,倒下就入睡,脾氣好,取快遞、



跑腿這些體力活全是他干。人緣也好,班上同學都喜歡跟他玩。他很喜歡上學,每天都去得很早,就是成績讓人惱火!”

“那你有沒有想過,萬一他成績好了,其他的卻不那么好了怎麼辦?比如學習的壓力大了,睡眠可能變差,脾氣可能變壞——你是想要一個這樣的孩子呢,還是更喜歡現在這個雖然成績不怎么樣,但是健康又開心的孩子?”我又問她。

她想了想,說:“這麼一想,我覺得他現在的

狀態挺好的。我應該看到他的好,不應該只盯着他不夠好的地方。”

這個孩子,成績也許有一天會提高,也許不會。但那又怎麼樣呢?他仍然是個好孩子,有一天站在別的賽場上,他的溫厚自會呈現它的價值。站在他的角度來看,現階段比成績更重要的事,是媽媽對他這個人的愛,而不是對學習成績和一切外物的愛。他感受到愛,內心深處就會生出安全感和價值感,生出紮實的力量,才有持續綻放的可能。

我們要看見孩子的好,看見生活的甜,這是世間的甘露。

看見是不容易的。它需要一顆澄澈的、沒有雜質的心。你看見了這短暫的安慰,也就能循著這絲絲縷縷、絡繹不絕的希望,穿越漆黑的長夜和無盡的荒涼。

作者:湯馨敏

真正的領導力是做自己

怎樣做一個真正的大人物?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希滕德拉·瓦德瓦在新書《內部掌控,外部影響》里特別引用了達·芬奇的一句話:“你永遠都不會有比對自己更大或者更小的支配權。”就是說,你得有一個強大的精神內核。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內心,才能在多大程度上支配外部事物。

有個青年女化學家叫芭貝特,她所在實驗室的老闆叫戈登。戈登是行業大牛,但是脾氣不好。有一次,芭貝特找戈登討論前一次交給他的論文,戈登一見面就說:“你這篇論文純屬垃圾,我已經扔垃圾桶里了。”

一個小人物被老闆這樣批評,該怎麼辦?芭貝特接下來的這段話,可以寫進教科書。

芭貝特說:“我寫得的確不行。我每次讀您寫的論文,總會想您怎麼能寫得如此清晰明瞭,這也是我想要跟您一起工作的原因。去年秋天您給我提供這個職位的時候,我真的太興奮了。咱們現在這項研究成果非常重要,如果我這篇論文能寫好,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論文已經這樣了,您看看能不能給我一些建議?我想跟您學習怎麼把論文寫好。”

戈登態度立馬好轉,把論文從垃圾桶里翻出來,跟芭貝特一起修改。

我們從芭貝特這段話里至少能找到5個談話技巧。1.先用認同提醒“對方咱們是一夥兒的”;2.表達贊賞,調動情感力量;3.幫對方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雖然論文寫得不好,但研究做得不錯;4.重申雙方共同的價值觀,都是為了讓論文產生影響力;5.提出具體行動方案,以此建立起共同成長的夥伴關係。

你可能很熟悉“談判技巧”“非暴力溝通”等談話技術,但這些都不

時候得了一場重病,在醫院里等待手術。有一天,醫生將她的父親叫到病房外,說了兩個壞消息:第一,你女兒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原計劃一星期之後的手術必須得提前到今天晚上;第二,醫院出現了一個狀況,沒法給孩子提供麻醉,手術只能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進行。

沒有哪個父親受得了這樣的打擊,但是回到病房,父親帶給女兒的,卻是兩個好消息:第一,醫生說今天就可以做手術了,不用再等一星期,這意味著3天之後你就能出院回家了;第二,醫生們一直在觀察你,他們認為你是最勇敢的少女,所以手術甚至不需要麻醉!

很多年以後,女孩才知道這番話背後的真相。她早就忘了當年自己是如何經歷那場手術的,但是她永遠都記得父親給她帶來的兩個好消息。

這是廣義上的領導力。領導力不是說你非得指揮誰、調動多少資源,也不一定是使用什麼套路或者權謀。領導力是你不能、敢不敢讓人、讓事情產生積極的改變。

真正的領導力是做自己。多數人都是按劇本走,別人安排什麼就干什么,那等於是工具人;只有當你跳出劇本,表現出主動性的時候,你才算活出了自己。

作者:萬維鋼



是最重要的。我們真正應該注意的是,在這番對話中,芭貝特和戈登兩個人,究竟是誰在領導誰?

答案顯然是芭貝特在領導她的老闆戈登。這就是領導力。領導力比的不是崗位指令順序,而是內核的大小。芭貝特真正了不起之處並不在於她使用了哪些話術,而在于她內心強大,可能比戈登還要強大。

瓦德瓦有個女學生,13歲的



20世紀20年代,繆麗爾·布里斯托爾參加了在英國劍橋舉辦的一次夏季下午茶話會。茶話會的座上賓是一群教授及他們的太太。在這樣特別的場合,茶話會的主人先給布里斯托爾倒了一杯茶,然後加了一些牛奶。布里斯托爾對此表示不滿,她解釋說自己喜歡“先加牛奶”,這樣茶味更佳。儘管在座的其他人都表示懷疑,布里斯托爾卻堅稱自己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別。同為座上賓的羅納德·艾爾默·費希爾此時冒出一個想法。

這位費希爾先生後來不僅晉爵為“費希爾爵士”,還憑藉著名的《實驗設計》一書成為現代經驗統計學的奠基人之一。費希爾的想法就是,同時泡8杯茶,其中4杯先加牛奶,另外4杯則先倒入茶,如果這位女士能正確分辨其中的差別,那么就證明她是對的(僥倖全猜對的概率只有1/70)。費希爾與其他在座的賓客一樣,認為布里斯托爾不會通過測試。換句話說,他們都認為布里斯托爾對於茶的敏銳判斷是建立在錯誤的美感和味覺基礎上,而非現實基礎。可結果是,布

先加茶還是先加牛奶

斯托爾正確地指出了每杯茶中茶與牛奶的添加順序。

費希爾的這一實驗後來進一步發展,改變了統計學和現代科學(它成為測試“零假設”的基礎)。不過在當時,如果一個人的喝茶習慣中沒有植入有關身份地位以及與之相關的美學理念,這個實驗未必可行。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牛奶的添加順序就一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徵,選擇哪一種添加順序暗示了一個人的階級地位。

這一切都可以從餐具由何製作而成得出結論。在維多利亞時代,如果先倒入熱茶,質地較差的茶杯很容易開裂。先倒入牛奶則可以降低茶杯開裂的風險。然而,那些富人買得起精緻的瓷器,能夠承受茶的熱度,所以後加牛奶就成為一個人經濟地位得到提陞的信號。事實上,茶和牛奶的添加順序這樣的實際問題,更多反映的是階級而非口感問題。畢竟,那些擁有精緻瓷器的人會用後加入牛奶這一行為,來展現這種奢侈的享受。正如表現那個時代風情的著名英劇《樓上,樓下》中的男家政服務人員所言:“我們這些樓下的人先加牛奶,那些樓上的人則後加牛奶。”

作者:[美]伊麗莎白·科里德-霍爾基特

大衛·吉爾莫是加拿大的一名影評人。在輔導兒子杰西學習拉丁語的一個下午,他忽然意識到,兒子是那麼不在乎上學這件事:“我注意到他沒有記筆記,沒有課本,什麼都沒有,面前只有一張皺巴巴的紙,上面有幾行關於古羅馬執政官的話需要翻譯。”

當終於瞭解兒子在學校是如何混日子之後,他也意識到,如果自己因為這些向兒子發火、引發衝突,或許會失去兒子。於是,大衛告訴杰西,如果他不想上學,可以不去,但有一個條件:杰西每周要和他一起看三部電影,影片由他來選。這是大衛希望杰西在輟學後繼續接受的教育。

在父子倆的這個“電影俱樂部”里,大衛將他們要看的電影分成了幾個單元:尋找影片中的“偉大瞬間”,可以是電影中的一個場景、一段對話或一段影像,它們能夠讓人在觀看時情不自禁地身體前傾,心怦怦直跳,享受“心虛的愉悅”,學習如何欣賞庸俗電影;“被埋藏的寶藏電影”;發現“了不起的喜劇”……

電影的確在大衛和杰西相處的過程中承擔了教育的功能。它是大衛向杰西表達自己情感的一種方式。大衛曾經想要以低價買入鄰居家的房子,這樣可以離他的前妻、杰西的媽媽更近。因此,他讓杰西找來混混朋友,在其他的人來鄰居家看房時做出一些干擾行為。鄰居看穿了大衛的心思,十分憤怒,最終也沒有讓大衛如願。杰西安慰大衛:“希望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並沒有錯。”

大衛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錯誤的,同時他

社交名單上的最後一名

想讓杰西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這件事。他說:“我就像電影《偷自行車的人》里的那個主角。我把必要性當成擋箭牌,假裝那樣做是正確的。”當他們看完電影,大衛偷偷地向四周張望,確認鄰居不在屋子外面。“現在每當我走到門廊上,都會往四周看,生怕那個傢伙會出現。這就是犯錯誤的代價,這是真正的代價。”

大衛用電影向杰西展示了人生的各種可能性,一部電影或許就會呈現一種人生選擇,甚至會展現多種結局。當杰西宣佈辭去餐館的工作,打算離開家和朋友從事音樂創作時,身為父親的大衛又開始擔心起來。但他自我安慰道:“好吧,他都十九歲了,順其自然吧。至少他知道導演邁克爾·柯蒂斯為《卡薩布蘭卡》拍過兩個結局,以防悲傷的結局不受歡迎。這有助於他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至少不能說他還毫無準備就被我送了出去。”

這對父子的故事被寫成一本名為《曾經少年》的書。這本書溫情動人的地方,除了大衛別具一格的教育方式,還有他細膩、溫柔的父親形象。這是一個以父親的視角講述的故事,書中有很多關於父親的心理描寫,這些描寫讓人體會到一個父親心思細膩的一面。

比如,將兒子從騙子手中救下來之後:“好好地扶持了他,保護了他,恪盡職守。事實上,我為事態的發展而暗自高興。過了某

個年齡以後,你就沒機會再為自己的孩子做那麼多了,你的精力已經不再旺盛,沒有能力再應付這些事了。”

看到兒子的背影時:

“他的內心是否充滿陽光?我想知道。這個步伐輕快的大男孩,我瞭解他真實的內心嗎?”

沒想到兒子真的能堅持做洗盤子的工作時:

“正如人們經常對自己的子女所做的那樣,我再次錯看了他。你會認為自己比其他人更瞭解他,這麼多年來上上下下樓梯,給他掖好被子,看他開心、難過、擔憂——然而你其實並沒有那麼瞭解他。說到底,他總有些地方是你永遠無法想象的。”

看著兒子走向他的朋友,準備一起遠行時:

“我只想把他拖上五秒或二十秒,這樣如果有什么壞事要發生的話,他就可以錯

過——幾步路,幾秒鐘,就因為這麼一點點時間,他可以逃過一劫。”

終於有一天,大衛意識到杰西或許不再需要電影俱樂部了,“某種程度上也不再需要我了”。他很失落:

“他不再是那個爸爸的乖兒子。你可能早就時不時地意識到這一天會到來,然而突然間,這一天真的來了。”

即便如此,父親總是慷慨的:“我情願做他社交名單上的最後一名。成為當他所有朋友都沒空時才能和他一起吃飯的父親,我也是開心的。”

作者:舒予

